

古典書法的範疇

說「書法學」浩瀚無涯，一點也不為過，因為從現今所發現最早的漢字符號（甲骨文）（圖5）考古資料可證，漢字已超過三千年的歷史，經過漫長的演進發展，書法從簡單的生活工具昇華為高層次的文化活動，附載了歷史、文學、哲學、藝術、美學等精神文明，撇開其因文字書寫而記錄語言的功能不談，純就藝術發展這一環節而論，它的內容的確包羅廣泛，大抵有：書史、字體、書家、書蹟、書評、書技、書法美學、書法心理學、書法藝術學、書法教育學、文房工藝、篆刻等項目，其中書法藝術學、書法美學、書法心理學、書法教育學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才興起的研究探索領域，古代的書學，實際上涵蓋的是書史、字體、書家、書蹟、書論、文房等六個範疇，以下分述之：



圖5：甲骨文拓片

代代傳承參照多 — 書史

對於歷史發展現象的探索與整理，有助於理解某一時代的政治、教育、社會、地理等對文化發展的影響，古代對書法史的研究大都採斷代的形式，至近代才有書法通史，但仍然以時代作為述論的範圍，書法史主要的任務是綜合呈現一個斷代的書法文化鋪展，商周秦漢時期，著重的是字體演進、書蹟材料、地域特色、政教影響等；漢末魏晉以後則開展了技法、評論、書家、書蹟、賞鑒等論著的風氣，宋元明清文人主流書壇，流派風格興起，刻帖流行、文房賞用催生了工藝製作的精巧層次，收藏

賞翫也提升了書法創作的藝術高度，明代中晚期進入了帖學審美的創作高峰，清中期以後碑學興起，唐以前的民間書法被翻上檯面而與文人帖學分庭抗禮。二十世紀以來，書法的實用性銳減，納入了藝術創作項類，展覽成為主要的書法活動。書法史的研究涉及了書法家、書法作品、書法理論、書法流派、創作技法、文房用品等，由於社會環境、文化思潮的影響，每一個時代的書法史都展現了不同的承傳狀態，而無論斷代研究或通史，莫不期於鉤稽各方面的理路脈絡，而提供欣賞、研學古代書法時，有一個清晰的知識概念。

近幾十年來，標名為中國書法史的著述達四、五十種，斷代式寫作的也有十數種，日本書壇這方面的著述為數也不少，內容雖多為普及性閱讀，但圖片多，對認識、欣賞古代書蹟頗多助益，少部分也譯成中文。學習書法大抵從臨碑摹帖入門，待各體經典有若干涉獵，則進一步了解古代書法的全盤內容是很必要的，那麼哪一種寫作方式的中國書法史，較能全面且清晰地呈現三千年書法史的脈絡，據目前書界評價較高的七卷本《中國書法史》(圖6)來看，這套書按歷史年代分為「先秦秦代卷」、「兩漢卷」、「魏晉南北朝卷」、「隋唐五代卷」、「宋遼金卷」、「元明卷」、「清代卷」，每一卷由一位學者(亦擅書法)撰寫，共三百多萬字，千餘張圖片，內容包含書家、書蹟、流派、書論、技法、文房等，可視作研究中國書法史的最新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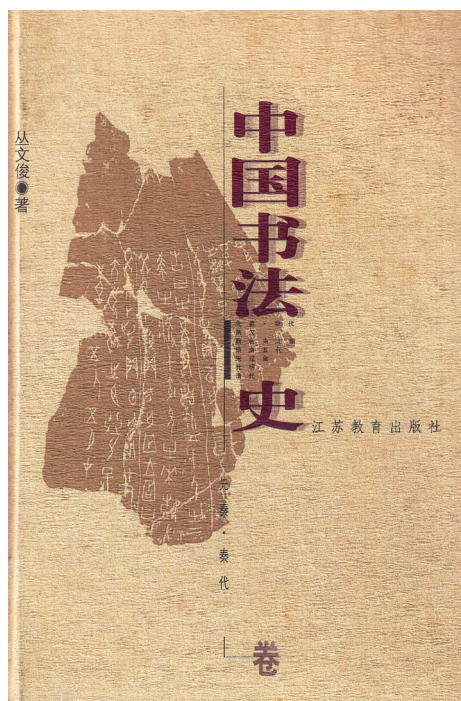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：七卷本《中國書法史》之一

形貌不一義相同 — 字體

書法簡單的定義即是書寫漢字的藝術，由於漢字傳承有緒，且演進有一定的法則，因此既作為藝術創作豐富的符號系統，它的形體演化充滿了先民的智慧，以致一個有意義的單字，可以寫成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五種點線形態迥別的字體，篆書包含商代的甲骨文、周代的金文、戰國時代的六國古文、秦代小篆、秦漢印篆（繆篆）。甲骨文出土於清末（圖7），在



圖7：殷商甲骨文

此之前學界對它一無所知，迄今出土了數十萬片，累計單字四千多字，百年來釋出者不及二千字。金文即鐘鼎文（圖8），鑄刻於銅器，從商晚期至漢代，長達一千五百年的使用，當時王室和諸侯列國紛紛造作各式各樣青銅器物，以為敬天禱神之用，甚至作為家國重寶，代代襲用，因此數量龐大，而銘文或長或短，西周時期大抵字形典正，如早期的作冊大方鼎，中期的師湯父鼎，晚期的大鼎、散氏盤（圖9）、毛公鼎（圖10）等；東周時期，五大諸侯國與其他小國各自為政，文字形體趨於地域化，除秦國石鼓文，楚帛書、簡牘（圖11），晉侯馬盟書（圖12）、中山王鼎、秦簡（圖13）等皆有草化現象，於是秦始皇統一六國，乃有統一文字之舉，由小篆為金文系統漢字的地域化畫下句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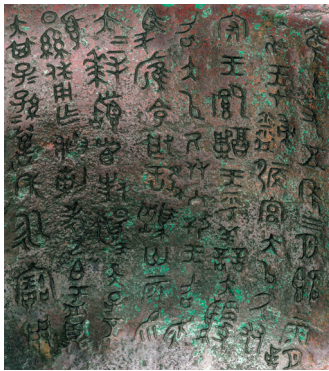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：西周金文（大鼎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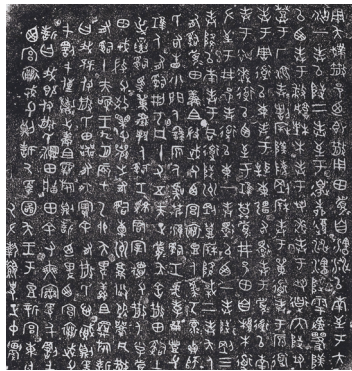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：西周散氏盤銘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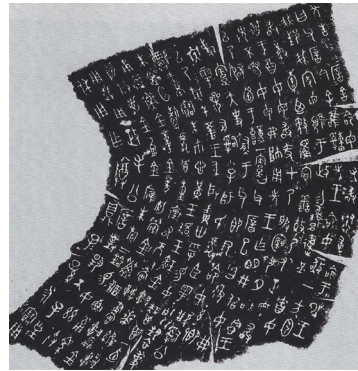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：西周毛公鼎銘文（局部）



圖 11：戰國楚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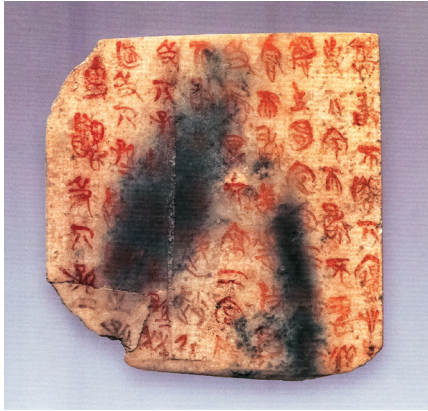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：晉國侯馬盟書



圖 14：秦小篆（泰山刻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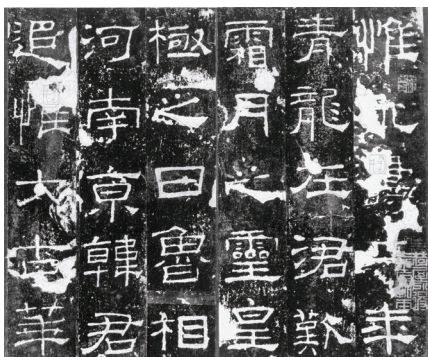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：漢石刻隸書（禮器碑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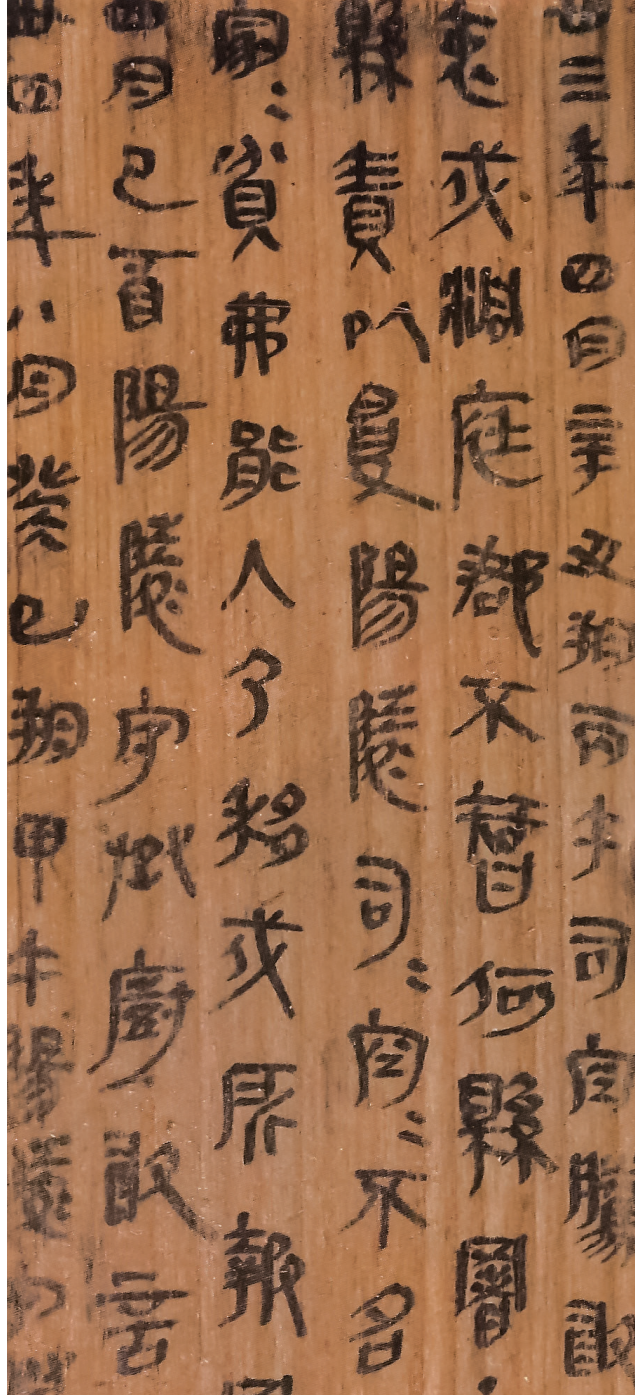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：秦簡（秦代里耶秦簡）

(圖14)。隸書在秦代又稱佐書，書寫上為求便捷，化圓為方，西漢時期的隸書留存於縑帛和簡牘上，東漢隸書則大量由石刻方式保存(圖15)，筆寫墨蹟與刀鑿明顯不同，碑刻的用途以記事錄史為訴求，點畫構形方整平正，而簡、帛書寫則趨於草寫簡化(圖16)，於是隸書演化為草草，流行於日常書寫，此時草書、行書、正書的概念漸次形成，由於文人涉入書寫，草書的筆鋒隨著技術的熟練而出現了巧妙與美感(圖17)，筆畫較多的行書也因筆鋒技巧的介入而更加流暢美觀，正書則因刻碑風氣盛行，在隸書已有折筆的現象中，發展出了起、收、轉折化圓為方的意趣，魏晉六朝書風化分南北，南方文人行草為尚，北方則魏碑流行(圖18)，草、行筆法、字形在東晉二王父子集前人大成下，確立了優美卓絕的法度，正書推陳智永和尚為墨跡絕品，歐陽詢(557-641)兼融南北，成為碑刻楷書的最高典範(圖19)。對於字體的研究，不外釋字，對於甲、金、古文是一大課題，其次是時代與地域特色，再者為書寫、鑄刻者的風格屬性，透過專家學者研究，進一步整理出代表性書蹟作品，乃至編輯字典，如此對於研學者而言，乃提供了創作時運用字體符號的便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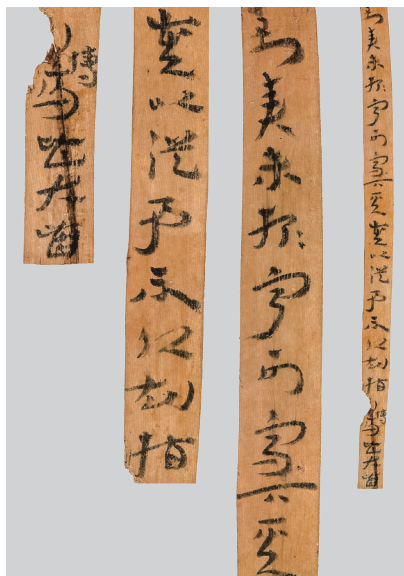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：漢木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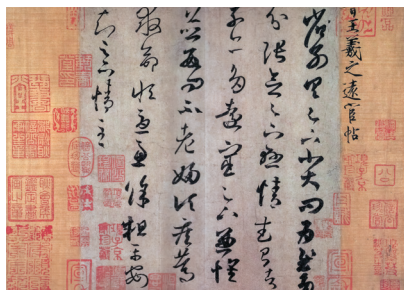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：東晉王羲之草書（唐人摹本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



圖 18：北魏石刻（鄭羲下碑局部）



圖 19：唐歐陽詢楷書（皇甫誕碑局部）

技藝高超領一代 — 書家

書法史上，書家的出現大約始於秦代，先秦的銘石簡帛，繕書者為下層官僚或匠人，秦代如李斯（？-B.C. 210）等大臣，都擅寫小篆，漢代官府有書佐負責各種詔令文書的書寫工作，東漢行草書風行，如劉德升擅行書，崔瑗、張芝等擅草書，史游工章草，蔡邕（133-192）是隸書大家，鍾繇（151-230）以正書名世，晉代索靖（293-303）、陸機（261-303）（圖20）、衛夫人（272-349）、王羲之（303-361）、王獻之（344-388）、王珣（349-400）至陳僧智永等在書寫技藝上達到筆法精純、造形雅麗的境界，唐代楷書五大家歐陽詢（557-641）、虞世南（558-638）、褚遂良（596-658）、顏真卿（709-785）、柳公權（778-865），行書推陸柬之（585-638）、李邕（678-747）、杜牧（803-852），草書有張旭（圖21）、懷素（725-785）、孫過庭、賀知章（659-744）、高閑等，五代以楊凝式（873-954）最有名，北宋蘇軾（1036-1101）、黃庭堅（1045-1105）、米芾（1051-1107）、蔡襄（1012-1067）（圖22）稱四大家，徽宗皇帝（1082-1135）的瘦金體迥出時流，南宋高宗（1107-1187）行、草優異，張即之（1186-1266）擅楷，薛紹彭、陸游（1125-1209）行書流暢灑脫。元代以趙孟頫（1214-1322）、鮮于樞（1257-1302）、康里子山（1295-1345）影響較大，楊維禎（1296-1370）的行草富個性化。明代初期臺閣體，以平正雅麗為特色，中期吳門書派崛起，文徵明（1470-1559）（圖23）、祝枝山（1460-1526）、王寵（1494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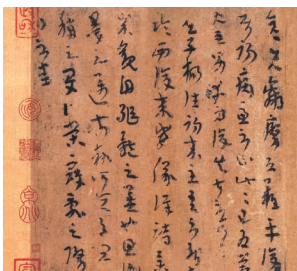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0：東晉陸機〈平復帖〉（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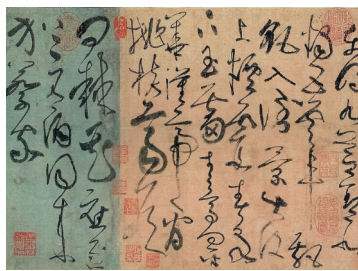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1：唐張旭草書〈古詩四帖〉（局部，現藏遼寧博物館）



圖 22：宋蔡襄行書（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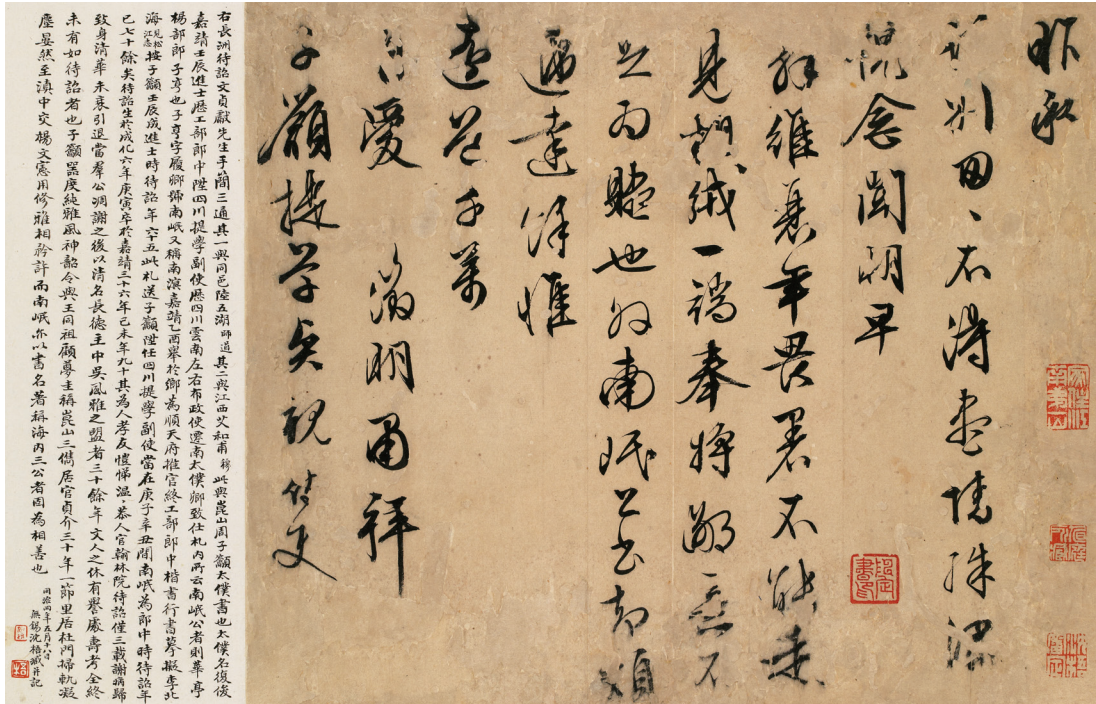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3：明文徵明草書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提供）

1533）、陳淳（1483-1544）（圖 24）、徐渭（1521-1593）、文彭（1497-1573）（圖 25）、王守仁（1472-1528）（圖 26）等，都是技藝高超之輩，晚期董其昌（1555-1636）出入古今，書風淡逸富禪趣，張瑞圖（1570-1630）、倪元璐（1593-1644）、黃道周（1585-1646）、王鐸（1592-1652）、傅山（1607-1684）則書史喻為浪漫個性書風。

清初帖學盛行，康熙朝學董其昌，乾隆朝師趙孟頫，都是二王書風最佳的代言，「三希堂法帖」繼北宋初刊刻的「淳化閣帖」成為士子文人學書的重要帖本，張照（1691-1745）、劉墉（1719-1804）、王文治（1730-1802）、梁同書（1723-1815）等是此時期帖學書風的代表人物。清中期以後碑學興起，篆隸、北碑起而流行，布衣鄧

石如 (1743-1805) 篆、隸成就高，金農 (1687-1763) 漆書、鄭燮 (1693-1765) 六分半書，個人風格突出，陳鴻壽 (1768-1822) 與伊秉綏 (1743-1815) 二人的隸書富造形趣味。晚清名家多在篆、隸、魏碑上著力，趙之謙 (1829-1884) 甚至用北碑筆法入篆、隸、行草，何紹基 (1799-1873)、楊岷 (1819-1896) 的隸書，吳讓之 (1799-1870)、楊沂孫 (1813-1881)、徐三庚 (1826-1990) 的小篆，都是一時之秀，楊守敬 (1839-1915) 於一八八〇年東渡日本，攜去六朝碑版數百種，改變了日本書風，被喻為「日本書道現代化之父」。清末民國吳昌碩 (1844-1927) 寫石鼓文，自出新貌，康有為 (1858-1927) 力倡北碑，沈增植 (1850-1922) 以碑融草草，民國于右任 (1878-1965) 作標準草書，齊白石 (1863-1957) 出入漢金，均有明顯個人特色及較大成就。由於書家是組建書史的重要元素，因此對不同時代成就高、貢獻多、影響遠的書家之個別研究，即著重於生平、學問、師承、創作、風格、影響等諸方面加以探討，以闡明古代千百書技優異名家，能為百世師、天下法的緣由始末，則對於賞鑒傳世作品的風格成因、特色將有實質的助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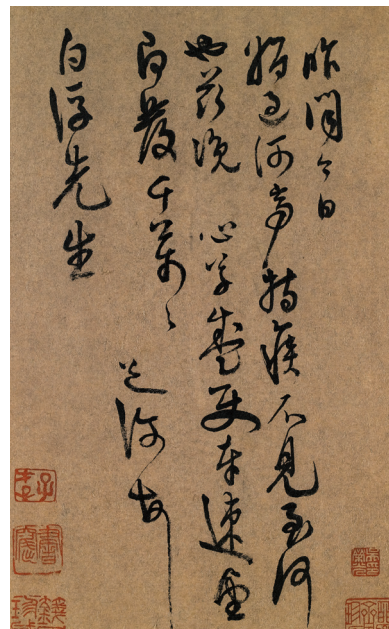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4：明陳淳草書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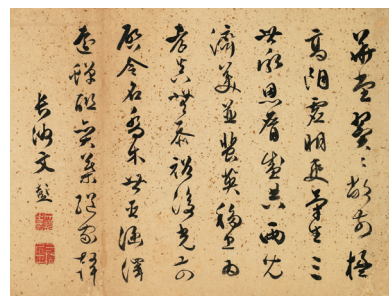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5：明文彭草書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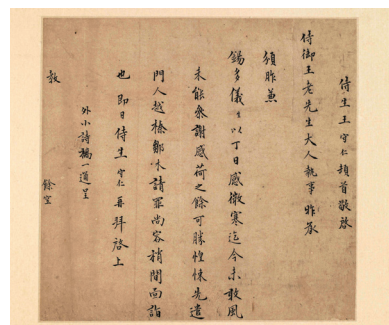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6：明王守仁行書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提供）

筆走龍蛇美不勝 — 書蹟

書法固然是書寫漢字的藝術，而作為保存的載體則包括了甲、骨、金、石、竹、木、帛、紙等，且書寫又延伸到鑄刻，因此書蹟存留的狀態多樣；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，金文是范鑄在青銅器上的，秦篆、漢隸、魏碑多是刻在石頭上，乃至崖壁上，戰國、秦漢大量的筆跡書寫是在縑帛、竹簡、木牘上，也有少量寫在玉石上。自從紙發明後，絹素固也偶用，但大量的書寫是採用紙張。魏晉南北朝以後，文人的書寫到達一種技法高度，於是詩文抄錄、尺牘稿札成為賞翫鑒藏，甚至學習筆法的範帖，於是眾多筆法精純、結字優雅、章法美妙、風格特出、內容生動的名家書蹟便被裝池、收藏、祕寶。部分筆法臻於神逸妙能的作品被製成摹本或刻帖，如唐初馮承素摹的王羲之《蘭亭序》，北宋初刻的《淳化閣帖》，於是書蹟的概念就包含了墨跡、摹本、刻搨，再加上甲、骨、金、石上的拓本，構成了豐富的書蹟寶庫。

當然，就書法藝術而言，書蹟的狹義，指的是書史上代表性書家的作品，其中又可分為兩個存傳的價值，其一是作為藝術精品寶秘，其二是作為範帖傳承。例如三大行書王羲之蘭亭序、顏真卿祭姪稿、蘇軾寒食帖（圖 27）；草書曠世巨作 — 懷素自敘帖、黃庭堅諸上座等帖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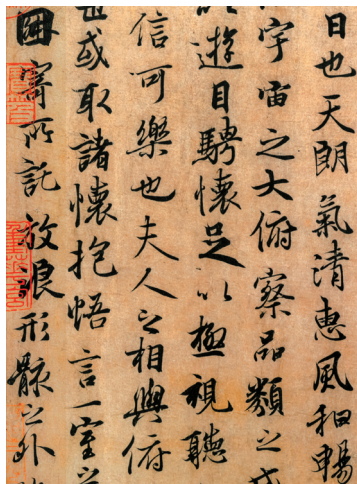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7-1：王羲之蘭亭序（局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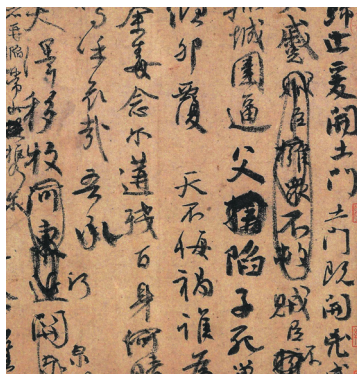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7-2：顏真卿祭姪稿（局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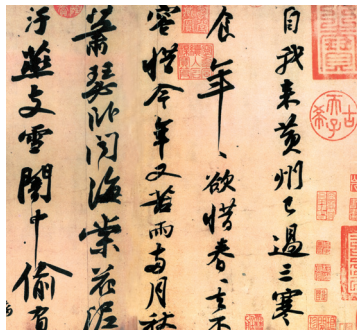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7-3：蘇軾寒食帖（局部）

祝允明前後赤壁賦、王鐸自作詩卷等，現今收藏在世界著名博物館或藏家的書法創作精品不下數百件。而如智永的真草千字文、孫過庭的書譜、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等、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、米芾的苕溪詩等、趙孟頫的行書閒居賦等，是學習楷、行、草諸體筆法、字形的絕佳範帖。事實上，正如孫過庭《書譜》中所言：「初學分布，但求平正，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絕，既能險絕，復歸平正。」因此歷代書法名家傳世作品，既可鑒賞，也是學習的帖本，只是須視書蹟創作的屬性而定，若筆法地道、字形平正則作為初學教材，充分發揮個性、章法造形變化多端者則作為自運、創作時的參照，譬如草書的研學植基於王右軍十七帖、智永千字文、孫過庭書譜等筆法清晰的名品，其次學習米芾、鮮于樞、王寵等的流暢，最後觀臨陳淳、祝允明、黃山谷、王鐸、傅山等的章法變化，循序漸進，方能有較大的體會。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後，照相印刷技術突飛猛進，古代墨蹟的複製帶來欣賞與研學歷代名作的極大方便，日本二玄社所複製故宮古代書畫精品，宛如真蹟再現，二十一世紀電腦掃描科技更上層樓，加上各公私收藏大量製作圖錄或複製品，使書蹟的欣賞大大超越古代任何一個時期收藏家，這種劃時代的狀況，對於書法研學所提供的資源豐富無比，因此學習書法的觀念也須適當調整，亦即廣泛臨摹，原色法帖（圖 28）為上，務求入古，並且不主一家一派，如此則可體會古典書法的風華與奧妙。



圖 28：書蹟出版彩色精印是一大趨勢（二玄社原色法帖系列）

其中道理說明白 — 書論

書法作為一項獨特的造形藝術，它是用毛筆這一特殊工具來書寫（漢字）創作，雖然表現元素不出筆法、造形兩大要項，但歷經兩千年的傳承推衍，歷代書家文人發表了許多看法和評論，篇目浩繁的述著，探討的內容十分廣泛，約可歸為三大面向：即理論闡釋、書風品評和書寫技法。茲列舉若干代表性著作以見梗概，理論闡釋方面，如唐孫過庭《書譜》、張懷瓘《文字論》、宋姜夔《續書譜》，明項穆《書法雅言》、趙宦光《寒山帚談》，清阮元《南北書派論》、馮班《鈍吟書要》、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、劉熙載《書概》（《藝概》第五卷）、楊守敬《學書邇言》、康有為《書鏡》等。書風品評方面如梁庾肩吾《書品》、袁昂《古今書評》，唐張懷瓘《書斷》、李嗣真《書後品》，宋朱長文《續書斷》，清楊景曾《書品》、梁巘《評書帖》，民國馬宗霍《書林藻鑒》等。書寫技法方面如梁武帝蕭衍《觀鍾繇筆法十二意》，唐韓方明《授筆要說》，元陳繹曾《翰林要訣》、釋溥光《雲庵字要》，明李淳《大字結構八十四法》、豐坊《書訣》，清朱和羹《臨池心解》、姚孟起《字學憶參》等。除上述三大類，還有不少綜合的述作，以叢書、叢輯、類纂、摘鈔、雜著等形式編輯，如明王世貞《書苑》、清蔣和《蔣氏游藝錄》，唐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，宋朱長文《墨池編》、陳思《書苑菁華》，清馮武《書法正傳》、朱履貞《書學捷要》，元盛熙明《法書考》，康熙敕編《佩文齋書畫譜》，明汪挺《書法粹言》、解縉《春雨雜述》，宋趙希鵠《洞天清錄集》，明陳繼儒《妮古錄》、李日華《六研齋筆記》、曹昭《格古要論》等。以上是略舉大要，其實古代談論書法的著述，或單篇或雜纂或泛論，往往兼賅博涉，加上又重視文章修辭，每每艱深難解，大部分未形成嚴謹的學術體系，故須廣泛閱讀，其間的道理才可以觸類旁通，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，書法成為獨立之學科，隨著資料大量出版，資訊傳遞普及，不僅臨池創作進入了嶄新的境界，理論研究也躍上流行的舞台，各有著重、專向的著作

蜂湧而出，特別是「書法美學」這一古代書論中從未出現的概念，專著已逾五十種，其他如書法藝術學、書法心理學、書法教育學、書法哲學、書法治療等新興的理論研究，也令人耳目一新。

賞用皆宜好器具 — 文房

書寫漢字能成為藝術，實與筆、墨、紙、硯所謂文房四寶有關，而其中又以毛筆為首要，其次是墨、紙的搭配和研成墨液的硯。在篆、隸兩種字體通行的時代，因書寫不在意筆鋒，毛筆的製作是「散卓」法，草書出現以後，為講求筆鋒，改良為「有柱有被」的工法，於是毫鋒的銳利加上運筆技巧的熟練，書寫產生了無窮的點線變化，這即是筆法。筆法的美妙來自動作的起伏、快慢、輕重、使轉等技巧，再因書法家不同的結構、章法（即造形）構成，「風格」就形成了，因此書法藝術的本質，簡要言之，即筆法技巧和造形風格。書寫要達到美觀、甚至精妙的程度，工具製作的精良也有佐助的功能，隨著毛筆鋒穎的銳利，潔白細密紙質的抄製，松煙、油煙墨應運而生，一方硯能否研出顆粒絕細的墨汁也不可忽視。然而書寫既已從實用提升為藝術，則相關氛圍、器用的搭配亦是形成文人風雅的媒介，於是文房四寶乃延伸為文房清玩、文房清供，成為書法範疇中不可或缺的經營事務。

文房的定義，大至宅第園林的經營，但通常談的是書齋，即寫作、創作的場所（圖 29），而書法研學者從「用」的工具到「賞」的「雅玩」，有一段提升的歷程，筆、墨、紙、硯就其材質而言，前三者為消耗品，但也不乏含帶歷史的古董級文物可資賞鑒，硯則久磨不壞，因此即便初入門也應擁有幾方好硯，古硯有銘款者難求，但實用的卻不難覓得，名硯中的端、歙、澄泥、洮河、松花江、青州（紅絲硯）等（圖 30）近代採



圖 29：文房、書齋場景

掘製作的上、佳品亦多。而環繞筆墨紙硯的相關器用，依歷代紀錄文房雅器的相關著錄，如宋趙希鵠《洞天清錄集》、明文震亨《長物志》、高濂《燕閒清賞箋》等的記載，文房用具主要除筆、墨、紙、硯四寶之外，尚有筆山、筆筒、筆洗、筆觚、墨牀、水丞、水注、硯滴、紙鎮、臂擱、硯屏、裁刀、印石、印泥盒等，此外琴、棋、香爐、茶器、碑帖、真蹟、圖書、古青銅器、巧雕、陶瓷、雅石、家具等可謂琳琅滿目，不勝枚舉。

可以說，文房器物，也就是工藝美術的一部分，由於自古以來書法在日常實用之餘，已經成為文人寄情遣興的游藝項目，臨碑摹帖、抄詩作文、尺牘信札等，蘊為一種生活雅趣，而文房作為營造閒、雅、逸、趣的空間，那些工藝美術發展上能工巧匠的技藝，廣泛搜羅而使之有助清歡，自是生活中無上的享受。因此，研學書法在入門之後即不能忽略文房。

文房事務中，鈐印是完成作品的最後一道程序，明代篆刻藝術開展以前，鑄印大都由匠工所為，極少數有書家寫篆委以匠工治印之例，其後篆刻獨立發展，與書畫並轡，書法家若不兼事篆刻，則用印必尋求名家創作，書畫用印雖為工具，但質優、色美、紐工、篆精的姓名、字號、齋館等印，引首、押角等閒章，對於臨池雅興的增華不無佐助，研學時豈能忽視。



圖 30：
硯的種類、品相繁多，端、歙最受喜愛並重視